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人口迁移变动趋势*

——基于人口普查和 1%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马 忠 东

【摘 要】文章基于 1982~2015 年人口普查和 1%人口调查数据,计算了所有普查年 5 年跨县迁移量,从 1982 年到 2010 年再到 2015 年,人口总迁移量从 2 863 万升到 1.46 亿,再下降到 1.32 亿。其中,户籍迁入的永久迁移从 2 420 万下降到 1 976 万后,继续下降到 1 432 万;离开户籍县的临时迁移从 443 万增长到 1.26 亿,然后微降至 1.18 亿;临时性的务工迁移从不足 200 万增长到 7 033 万后,再下降至 5 707 万。文章发现,人口迁移已实现从计划性的永久迁移向市场性的临时迁移的转变,对市场转型、城镇化和工业化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人口迁移实现了从个人行为向家庭行为的转变。与 2000 年相比,2010 年劳动力峰值受高校扩招影响,从 5.9%上升到 9.5%,已婚青壮年的迁移率比 10 年前大幅提高,并取代未婚青年人群成为迁移的主流。此外,由累积值计算的 2010 年儿童留守率高达 62.8%,中青年妇女净留守率为 21.7%,表明市场化后风险的提高迫使家庭居住分离以劳动力迁移的方式来分散风险。一旦克服风险约束后,回流增加较快。文章建议,政府在政策上营造宽松环境,以保障未来迁移向优质化、家庭化和长期稳定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人口迁移 经济转型 中国

【作 者】马忠东 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

一、研究背景

人口迁移是改革的标志,发展的核心要素,经济成长的晴雨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历程,人口迁移和市场转型尤其重要。如果中国没有持续增长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流动,就没有波澜壮阔的工业化,也就没有今天的发展成果。从经济转型、世界工厂的建立到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劳动力迁移起到了关键和不可磨灭的作用。

学术界通常用刘易斯城乡二元模型来论述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与工业

* 本文为香港大学研究基金会项目(GRF.642212/ GRF.16401014)的阶段性成果。

化相互促进,最终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国以往的“民工潮”验证了刘易斯模型中“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古典假设。然而,2007 年之后,人们对此产生了怀疑。蔡昉(2008)藉“刘易斯拐点”论述农村剩余劳动力因大量迁移而耗尽,以往低水平的工资从此随着劳力需求的增加而逐渐上涨,而这一拐点的出现,表明无限供给的假设已不复存在。然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并不支持拐点论。虽然 2008 年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但离开户籍地(乡镇街道)的流动人口却从 2005 年的 1.47 亿增加到 2010 年的 2.41 亿,离开户籍县流动人口从 2000 年的 7 880 万上升到 1.71 亿(Liang 等,2014)。此后,2015 年流动人口规模又微增至 2.47 亿(段成荣等,2019),这似乎表明劳动力迁移还在缓慢增长,而不是下降。

虽然“民工荒”现象已在全国许多城市扩散,但从流动人口数量看,不能证实“刘易斯拐点”已出现,剩余劳动力已耗尽。如果从中国特色现代化角度思考,40 年发展过程可以总结为经济转型和工业化的“双部曲”。仅用刘易斯模型来解释会忽略经济转型对人口迁移和工业化的影响,包括制度转变、政府参与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以及农村家庭应对风险变化而采取的各种策略。从流动人口的性质看,它是一个存量概念,包括 5 年甚至 10 年以前就离开户籍地的人口,不包括户口转入的永久迁移。严格地讲,以往研究仅用流动人口数量进行趋势分析是不够科学的。

科学分析 40 年中国人口迁移的发展趋势,关键在于如何勾画出人口迁移和工业化的大趋势。本文利用 1982~2015 年全国人口普查和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带,在小误差范围内推算不同年代迁移总量和结构,分析其发展趋势,并与经济转型紧密结合,展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城乡转型模式和假设

在刘易斯(Lewis, 1954)提出的城乡二元模型中,一方面是工业为主的高生产率的城市部门;另一方面是低生产率的传统农村经济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城市工业扩张引发农村剩余劳力向城市迁移,而其廉价的劳动会给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利润,继而再投资,扩大资本规模,吸引更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模型中,新增劳动力(ΔL)与工业投资成正比,而投资来自前期利润,且大致和前期劳动力规模成正比($\Delta L \propto L$)。这一循环持续不断,直至农村剩余劳动力彻底消失,此时劳工成本开始上升,而由于大量劳动力已迁入城市,工业化得以实现,传统社会遂转变为现代社会。

在计划经济下,城市国有部门类似托达罗模式中城市制造业部门(Harris 等,1970),对大型国有企业的偏好使其平均工资(W_s)远高于市场平衡点。虽然国有部门就业概率(p)较低,但如果其预期收入(pW_s)高于农村平均收入,仍会吸引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进而推高城市失业率和城市贫困率。

针对转型社会,本文把城市经济划分为国有部门(占比为 g)和私营部门(占比为 $1-g$)。由于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人力成本高,效率低,加上社会负担重,所以国有部门创造就业能力低,用 α 表示国有部门创造就业系数, k 表示单元投资私营对国有部门创造就业系数的倍数($k>1$)。另外,本文假设转型经济中国家净收入源自私营部门利润税收,国有部门的投资也与劳动力规模成正比。期内市场化(私有化或产业化)造成国有到私营部门转移之后比例($g-v$)。两个部门劳动力需求增量之和(ΔD)及增长率(d)分别用以下公式表示:

$$\Delta D = \alpha [(g-v) + k(1-g+v)] \times L \tag{1}$$

$$d = \Delta D / L = \alpha [(g-v) + k(1-g+v)] \tag{2}$$

在农村劳动力供给方面,本文假定同时存在两类迁移,I类迁移是个人承担风险,响应国有部门高预期收入(托达罗型);II类迁移是斯达克(Stark, 1991)迁移理论中家庭以劳动力迁移为策略,增加不同收入来源,分散风险。转型社会中,小农家庭可能会承担市场化(包括公共服务产业化)带来的高费用和高风险。本文用国有转私营比例(v)来近似市场化速度及风险提高程度。因此,劳动力供给或迁出增长率(s)可以分解为年轻人口增长(l)、国企占比($g-v$)和其市场化比例(v)的线性组合。

$$s = l + \beta \times (g-v) + \delta \times v \tag{3}$$

依照这一转型模式,本文针对一系列重要因素(包括产权结构、私有化、政府参与、户籍制度和国家投资)进行假设,研究其如何影响劳动力供需和迁移增长。

首先,本文对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产权结构提出假设 1:转型中,劳动力需求的增长(d)主要依赖私营部门的扩张,随私营占比($1-g$)及投资就业率(k)的提高而提高。比例逐渐上升,劳动力需求增长由慢到快,并自我加速,而工业化后期增长会因投资回报递减,就业效率(k)的下降而趋缓。国有部门的转制(或产业化)是转型的核心推力,用国有到私营部门的转移比例(v)来代表,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2:需求方面,转制短期会减少就业,推高失业率,但其造成的转移部分(v)会在下一阶段私营部门的投资中 k 倍增长,从而推动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在供给方面,国有部门转制提高了整个社会的风险水平,促使 II 类家庭以劳动力迁移来分散风险。因此,市场化会从供需两方面提高就业和迁移增长。转型和工业化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参与和合作,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地方政府的参与,包括提供国有资源(如廉价土地)和减免启动税收,会降低投资成本,增加利润率,提高单元投资的就业率(k),投资者因此会增加投资和扩大就业规模,间接提高了劳动力需求和迁移增长。经济增长后也会为地方政府带来更多土地税收,吸引更多私营投资和扩大就业需求。但要素价格偏低情况下,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率,会导致过度工业化,进而造成劳动力供不应求。本文针对公共投资在转型中的影响提出假设 4:加大国有投资

规模,虽然有乘数效应,但也会对私营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同时会提高(国有部门)预期收入而增加 I 类迁移。即便国家投资规模大,转型会出现逆向($v < 0$),就业效率会大幅下降,整体上对就业和迁移增长的影响有限甚至产生负影响。

为了验证以上假设,本文使用普查数据带(1982~2015 年)5 年跨县迁移数量的变化来描述人口迁移趋势。具体定义是普查前 5 年所有户口迁入其他县的永久迁移加上离开户籍县半年以上的临时迁移。根据 1987 和 2015 年全国 1%人口调查和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直接计算出 5 年的迁移数量。其他普查由于定义不完整而存在小比例的漏查,如半年到一年的临时迁移数量(1990 年四普)或省内的永久迁移(2005 年 1%人口抽样和 2010 年六普)。根据以往普查同类迁移的比率,本文用间接法估算这些遗漏值,继而推算 5 年的迁移总量,误差控制在 4%以内,再用公安部户籍和国家统计局劳动力调查数据,估算 1982 和 1995 年迁移数量。计算永久迁移占比作为迁移转型指标,再用城镇人口占比作为城镇化指标。计算各个时期分年龄迁移率用于分析 I 和 II 类迁移率变化,再用不同人群累积迁移率之差计算留守率。最后,本文计算了返回户籍县的迁移人口数量。

根据本文的转型模式可以推测,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迁移会由慢到快加速增长。由于私营部门主要吸收临时迁移劳动力,就业效率高,加速增长,计划性的永久迁移的比重(p)和国有部门就业比重(g)会随市场转型而下降。转型前期,I 类迁移为主,集中在年轻未婚人口。转型中后期,II 类已婚青壮年迁移率会大幅增长,以应对 1996~2005 年市场化后风险水平的提高。同时,在户籍政策的限制下,分散风险的家庭策略意味着外出打工者与家庭居住分离,从 Fan(2016)、段成荣等(2017)研究来看,农村家庭户分离和留守儿童的大量存在是近期迁移的一个趋势。除了受户籍限制外,如果目的是分散风险,II 类迁移中会有较高的儿童留守率及相当程度的妇女留守率。另外,随着 II 类打工者在城市里经验和资金的累积,一旦风险约束突破,返乡增多也会成为一种趋势。

地方政府的参与,尤其是廉价工业土地,使工业在 21 世纪 00 年代加速成长。以上供需双方的所有正效应加上这一时期年轻人口的增长,迁移在 21 世纪 00 年代后期快速增长。21 世纪 10 年代,转型似乎出现了反转,首先国家规划了大规模投资以应对 2008 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其次年轻人口出现一定程度的缩减,但高校扩招仍在继续。虽然有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挤出效应加上年轻人口减少会使迁移总量下降。

三、迁移趋势分析

(一) 5 年跨县或省际迁移的趋势

如图 1 所示,中国 5 年跨县迁移量(以百万计)经历了从慢速到快速增长再到近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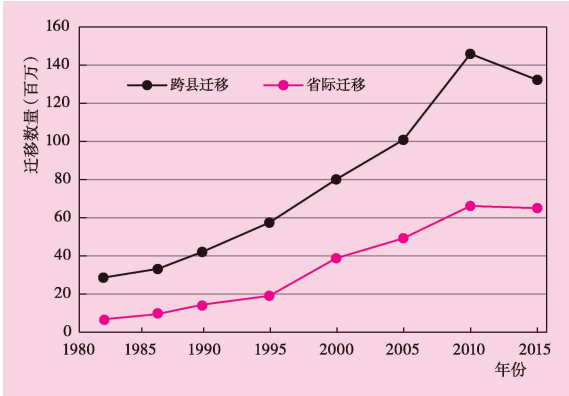


图1 1982~2015年跨县和省际迁移数量

注:根据加权的人口普查和1%抽样调查数据带计算或估算得到。1987、2000、2015年迁移数分别依据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200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直接计算。1990年人口普查遗漏了半年到一年的临时迁移,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2010年人口普查遗漏了本省永久迁移,按过往同性质迁移的比率进行估算。1982和1995年的估算分别使用公安部永久迁移和统计局劳动力调查数据。

平缓下降的转变。从1982年的2900万缓慢增加到1987年的3132万,1990年的4200万。20世纪90年代开始,迁移快速增长到1995年5700万,2000年的8013万,2005年突破1.01亿,2010年达到顶峰(1.46亿)。这种由慢到快的加速趋势与本文转型模式的预测相符。2015年,快速增长趋势开始逆转,迁移量回落到1.32亿,预示未来迁移可能出现的平缓下降趋势。省际5年迁移(包括离开户籍省)也有类似变化趋势,从1987年的719万增加到1990年1403万、2000年的3879万、2005年的4929万、2010年的6622万,微降到2015年的6508万。

(二) 务工迁移和工业化/城镇化

务工迁移是离开户籍县外出务工半年以上、5年以下的临时迁移,相当于临时打工,在刘易斯模型中属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迁移。在计划经济时期,务工迁移受到严格控制,那时称为临时工。1987年跨县的只有243万。沿海地区开放后,务工迁移数量逐步增加到1990年的1237万,1995年的2062万,2000年的3624万,2005年的5025万,2010年7033万,2015年回落到5707万。跨县外出务工总数(包括外出5年以上务工人员),从1982年时的231万,上升到1990年的1523万、2000年的4706万、2005年的6826万、2010年的9899万、2015年的9220万。图2显示,务工迁移与工业化和城镇化总趋势大致相同,与城市化呈平行增长趋势。

从图2可以看出,农业就业比重从1982年的68.1%下降到1987年的60.0%,伴随着务工迁移的快速增长,这个比重从1990年的60.1%下降到2000年的50.0%、2010年的36.7%、2015年的28.3%。换言之,非农(工业、服务业)就业比重从1982年的31.9%增加到2015年的71.7%,表明中国40年的工业化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根本转变。1990年以后,工业化最主要因素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并在规模日益扩大的工业和服务部门就业。具体到第二产业的发展,经济转型中,务工迁移和工业发展趋势并不像刘易斯模型中那样同步快速增长,1982~1987年、1987~1990年、1995~2000年3个时期发展不同步,甚至背道而驰;1990~1995年和2000~2010年同步增长;2012~2015年同步下降。下面本文具体分析各个时期的发展过程,部分内容参考了陈锡文等(2008)

和盛来运(2008)的研究。

1982~1987 年,一方面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从 18.4% 上升到 22.2%;第三产业比重从 13.4% 增加到 17.8%。另一方面人口迁移仍然增长缓慢。即便国家在 1984 年出台了新政策,允许农民在自理口粮的条件下进城务工,但 1987 年务工迁移只有 243 万。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其就业人数从 3 110 万增加到 8 810 万,创造了 5 700 万个新岗位,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缓解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巨大压力。事实上,乡镇企业当时的宣传口号是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与政府对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严格控制是一致的。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出现了经济发展放缓,1987~1990 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从 22.2% 下降到 21.4%,第三产业比重只微增到 18.5%,而务工迁移却从 243 万大增到 1 237 万。工业(包括乡镇企业)发展停滞,经济放缓,临时迁移却快速增长。1989 年春节后出现的第一次“民工潮”。随着海外投资进入、城市扩张和收入增长,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开始增加。数以百万的年轻农民离开内陆省份前往珠三角、北京和上海等地,在外资工厂、建筑公司及公共服务或当地社区服务中寻找临时工作。随着民工规模的迅速增长,各级政府开始通过发布指导性文件来规范制止所谓的“盲流”,防止城市就业压力和基础设施负担过重。

1995~2000 年,出现了恶劣的经济环境,第二产业比重从 23.0% 下降到 22.5%,而务工迁移却反增到 3 624 万,这与国企转制密切相关。一方面,来自外企、私企和乡镇企业的竞争,导致国有企业产品价格和利润急剧下降,迫使国企抓大放小。超过 2 000 万国企工人下岗,主要来自众多亏损的小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制导致整个第二产业的就业份额下降。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投资、贸易和就业状况恶化,出口产品需求减少,城市的失业率飙升。当时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出台各项政策和相关收费,阻止民工的涌入,目的是为了减少民工与本地下岗工人的就业竞争。另一方面,沿海地区私营企业保持快速增长,其就业人数从 600 多万增加到 1 270 万;海外投资并没有因亚洲金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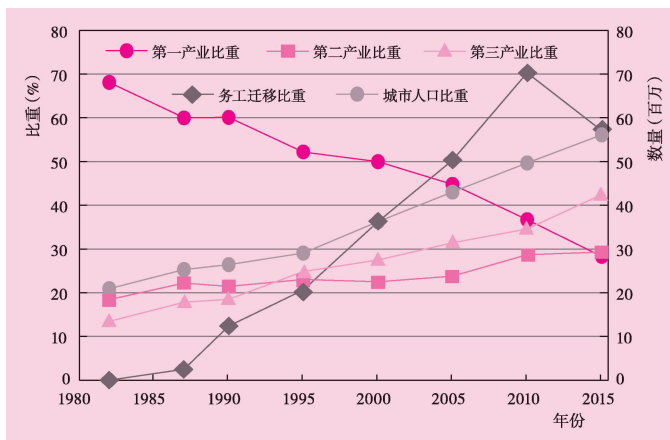


图 2 务工迁移量与产业(就业)结构及城镇人口比重

注:跨县务工迁移量和城镇人口比例根据加权的人口普查和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带中迁移原因为“务工经商”的数据计算。1990 年人口普查遗漏了半年到一年的劳务迁移数,按 1987 年短期务工占比进行了估算。1995 年的估算参照统计局劳动力调查数据。历年三次产业结构比重数据来自 2016 年《人口与就业年鉴》23~24 页表 1~15。

危机而下降,外企就业人数增加到640万,私营企业的总就业规模增加到1910万,个体经营者增加642万,总共为2778万。沿海地区私营和外资企业始终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内陆地区农村的年轻人去沿海地区打工。私营部门的高速增长一大部分抵消了城市国有部门和乡镇企业的下降,同时促进了迁移的增长。这一阶段更像是托达罗模型和刘易斯模型的结合体。

务工迁移量和工业同时增长有两个时期。第一个双增长时期在市场化刚刚开始1990~1995年,这个时期劳动力迁移和工业增长同步缓慢增长,务工迁移量比前期增加642万,达到2778万,第二产业比重从1990年的21.4%提高到23.0%,第三产业比重从18.5%提高到24.8%。市场化始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海外投资在沿海城市倍增,城市私营部门(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迅速发展,就业人数从220万激增到880万,使城市经济和所有权结构开始多样化。相比之下,就业在乡镇企业停滞不前,在国有企业甚至下滑。许多公职人员和国企技术人员暂时离职,“下海”到沿海地区私营部门创业。

2000~2010年,劳动力迁移和工业同步快速增长。从2000年到2005年再到2010年,务工迁移从3624万增加到5025万再飙升到7033万,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从22.5%微升到23.8%再上升到28.7%,后5年增加了近5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比重平稳上升,从27.5%到31.4%再到34.6%。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迎来了进一步开放的机遇。地方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低成本土地供应,减免启动税等方式,在招商引资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其目的是实现本地工业高增长,并收取土地相关的税费为当地创造财政收入(俗称“土地财政”)。中央政府于2003年颁布一项政策,首次认可务工迁移的合法性,消除对务工的各种障碍和不合理收费,并呼吁保障打工者的权利,以促进农村劳动力尽快向城市转移,为工业化服务。然而,户籍制度却保持不变,没有当地户籍,打工者也就缺少改善工作环境和收入的话语权,导致外来打工者收入长期低于本地居民,在迁入地被边缘化。从迁出地看,随着乡镇企业就业和农民收入的下降,农村状况进一步恶化,主要由于农产品市场化,生产粮食的种子、化肥等价格飞涨,而市场粮食价格在丰收后走低,再加上农民各种税费负担增加,公共部门医疗、教育产业化也带来了风险和费用的大幅提高。

此时的高速增长模式是加强版的刘易斯模型,结合国家私人和海外投资,天时(加入世贸组织)、地利(地方政府提供廉价土地)、人和(迁移带来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很快就掀起了海外和私营企业的投资热潮,高利润再投资又促进了私营企业就业的快速增长,继而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迁移。2010年,有近1亿跨县务工者在制造业、建筑业和商业部门工作,对出口行业、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及整体经济做出了巨大贡

献。迁移增长的势头被 2008 年的世界金融危机阻断,政府为应对危机进行了大规模公共投资。2009 年又恢复了增长。经历高速工业增长,21 世纪 00 年代中后期在个别发达地区(珠三角)出现了“民工荒”。然而,这种民工短缺当时并没有大范围扩散。

从 2010 年到 2012 年再到 2015 年,务工迁移量从 7 033 万骤减到 5 707 万,第二产业比重先从 28.7% 升到 30.3% 然后降到 29.3%,第三产业比重从 34.6% 上升到 36.1% 后再急升至 42.4%。尽管有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但经济增长率还是从两位数下降到 6%~7%。随着大城市土地和房地产价值的暴涨,大量国企投资涌入房地产,引发泡沫、巨额地方债务及住房相关行业的产出和产能过剩。这一轮发展市场转型略有逆转,得益的主要是大型国有企业、房地产业和大城市,小型私营企业、制造业和小城市则处于不利地位。劳动力成本、租金和人民币汇率的同时上涨,许多出口导向的工厂被迫关闭或搬迁到其他低收入国家。多个工业部门因出现供应和产能过剩,对劳动力需求急剧下降。虽然这一时期 20~24 岁人口从 1.3 亿下降到 1.0 亿,高校却在继续扩招,从每年 600 万人增到 700 万人。扩招增加了高校生迁移,但对年轻人务工迁移起到了延迟和挤压效果,同时大规模公共投资对私营企业的投资产生了挤压作用。由于这些逆转效应,经济下行,扩招和新增劳动力的减少,务工迁移出现锐减之势。以往长期打工者的续留,抵消了锐减的大部分影响,外出打工者总数由 2010 年的 9 888 万下降到 9 220 万,尚未出现大幅下降的局面,但“民工荒”现象已在全国城市蔓延。原因主要是,在社会方面,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一代不太愿意从事低技能工作,但由于缺乏实际技能和经验,又不太胜任技术工作。经济上,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行业和房地产业发展放缓,导致对劳动力需求减少、而劳动力供给因年轻人减少,条件改善和农村收入快速增长而减少。可见,劳动力迁移和工业化在转型中并非同步持续增长,取决于转型快慢、所有制结构和政府行为等一系列因素,以上描述的发展趋势符合本文的转型假设。

(三) 迁移的市场转型:永久和临时迁移的变化趋势

永久迁移属于计划内,而临时迁移大多属于计划外。分析永久和临时迁移的不同发展趋势并与其他市场化趋势对比,有助于深入了解迁移增长的内因和市场化的进程。如图 2 所示,除 1990 年的 1 893 万外,永久迁移量在改革前期大多保持在 1987 年的 2 221 万到 2000 年的 2 549 万范围内,2000 年后开始下降,2005、2010 和 2015 年分别降到 2 231 万、1 976 万和 1 432 万。一个重要因素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由 20 世纪 80 年代的免费教育到 90 年代的低收费再到 21 世纪 00 年代的高收费,扩招后改变了国家分配工作制度,转向市场录用。这一转变,从 21 世纪 00 年代中期开始,大部分高校学生保留原籍户籍入校学习,其迁移性质由永久转为临时。

从图 4 可以看出,临时迁移从 1982 年到 2010 年保持由慢到快再加速的增长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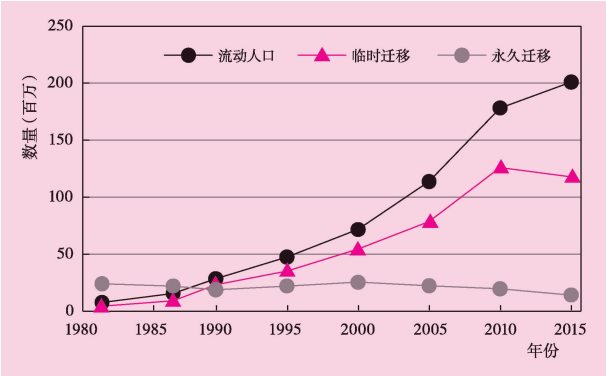


图3 1982~2015年流动人口永久迁移和临时迁移数量

注:同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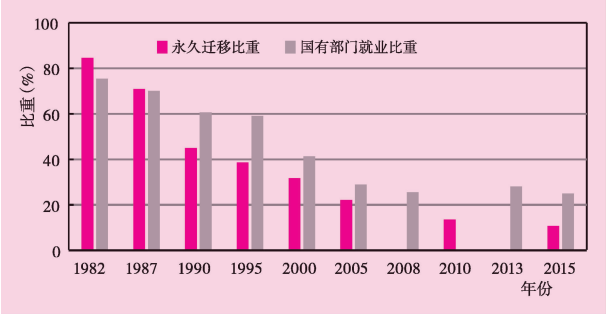


图4 1982~2015年永久迁移和国有部门就业比重

注:城镇国有部门比重的计算参照《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及2008、2013年《经济普查年鉴》数据计算政府和国有(控股)企业就业总数除以城镇就业总数。

从1982年估算的443万,增长到1987年的911万、1990年的2319万、1995年的3523万、2000年的5464万,2005年的7852万和2010年的1.26亿,直到2015年才缓慢降到1.18亿。每5年的增量逐步递增,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468万,到90年代后期的1941万,再到21世纪00年代后期的6591万。相应的流动人口(离开户籍县半年以上)分别为1982年的766万、1987年的1576万、1990年的2854万、1995年的4758万、2000年的7172万、2005年的1.14亿、2010年的1.78亿和2015年的2.01亿。尽管2015年临时迁移数量比2010年缓慢下降,但流动人口不减反增。可见,用流动人口数(存量)进行趋势分析,无法判断人口迁移数量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

临时迁移与务工迁移的发展趋势类似,但值得关注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为什么1977~1982年永久迁移较多,临时迁移较少。当时,除4个经济特区外,计划经济仍然在城市地区占据主导地位。政府当务之急是恢复高考和进行农村地区改革。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中770万跨县一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和每年公安局跨地区户籍变动的数据,本文估算的5年间永久迁移、临时迁移和总迁移数量,分别为440万、2420万和2860万。永久迁移居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800万下乡知青返城,以及恢复高考后1978~1981届高校在校生和1977届高校毕业生迁移。相比之下,临时迁移微不足道,仅占总数的1/6,反映出在计划经济下对人口迁移的严格控制。从1978年到1982年末,农村家庭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逐步取代了公社制,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把成百上千万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大大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潜力。

二是高等教育产业化(高校扩招)后,高校在校生迁移性质发生了改变。扩招本来是

为了应对大批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出生人群,延迟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减缓 21 世纪 00 年代中后期就业压力,招生数量由 2000 年的 200 多万逐步增到 2010 年的 600 多万,扩招后增加了 2 000 多万在校中专生和大学生,对相同年龄段务工迁移起到了分流作用。因此,永久迁移从 2000 年开始下降,而高校生临时迁移大增。

迁移的市场化趋势可以从永久迁移比重下降(或临时迁移比重的增加)来反映。从图 4 可以看出,永久迁移比重从 1982 年的 84.5%下降到 1987 年的 70.9%,反映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有转变但计划性仍然很强。之后,这一比重迅速下降到 1990 年的 44.9%、1995 年的 38.7%、2000 年的 31.8%,说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开放和 90 年代外资的大量涌入,以及私营企业的兴起,改变了产权结构,使大部分迁移转向市场。21 世纪 00 年代之后,永久迁移比重继续下降到 2005 年的 22.1%、2010 年的 13.5%、2015 年的 10.8%。另外,城镇就业的市场化转型可以用国企就业比重的变化来反映。1982~2015 年,国有部门(包括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保持在 1 亿左右,而私营企业从 0 增长到 1.4 亿,个体从 147 万增加到 7 800 万。国有部门就业比重由 1982 年的 75.5%、1987 年的 70%下降到 1990 年的 60.7%、2000 年的 41.3%、2008 年的 25.6%、2013 年的 28.1%和 2015 年的 24.9%,私营部门从 0 增长到 2015 年的 75.1%,这一转变反映了就业市场转型的实现。而临时迁移的民工占据了私营企业就业的绝大部分。也就是说迁移和就业市场化是并存且相互促进。在这个转型大趋势之外,国有部门 2013 年相对于 2008 年的比重反弹了 2.5 个百分点,证实了 21 世纪 10 年代初出现逆转型。

1990~2010 年临时迁移数量加速增长,永久迁移比重持续下降,而近期逆转型时临时迁移的下降,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验证了本文转型模型的假设。

(四) 迁移年龄模式的变化趋势

本文将分年龄总迁移率和“务工经商”的务工迁移率分别绘制成图(见图 5)。本文中迁移率以 1%以下、1%~2%、2%~4%、4%~6%和 6%以上分别表示“极低”、“低”、“中等”、“高”和“极高”水平,大于 2%年龄区间连线称之为劳动力迁移率中等值“底部”。2000 年,0~14 岁处于极低水平,从 0~1 岁的 0.90%左右下降到 14 岁的 0.34%。然后是以 18~27 岁为“底部”的劳动力高峰,迁移率从 16 岁开始上升,19 岁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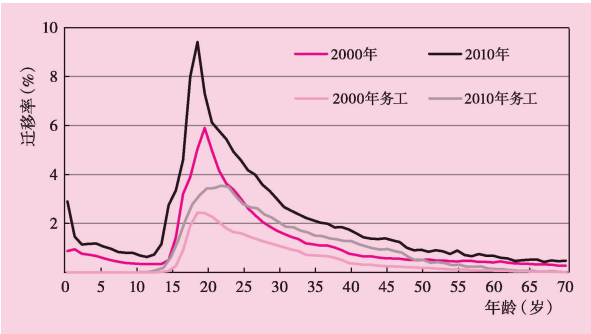


图 5 2000 和 2010 年中国分年龄迁移率

注:2000 和 2010 年分年龄的迁移率根据加权的五普和六普数据带计算得到,分子是分年龄的迁移数,按迁移发生时准确年龄排序,分母是分年龄的 5 年累积人口。

到最高峰值(5.90%),然后快速下降到27岁的2.07%。随后在低水平区间缓慢下降,直到69岁的最低值0.28%。2010年,0~2岁从2.89%快速下降到1.14%,4岁缓慢下降到11岁达到极低的0.63%,再快速回升到14岁的2.76%,整个0~14岁曲线构成一个U形,而不是标准迁移模式中的由高到低的下降斜线(与24~38岁的父母斜线平行),反映大量留守儿童的存在。其中,最突出的是以15~35岁为“底部”,向上形成一个劳动力高峰,迁移率从15岁的3.35%开始快速提升到18岁的9.47%(最高峰值),同样快速下降到20岁的6.12%、25岁的4.17%、30岁的2.67%,然后缓慢减少到35岁的2.03%。36~47岁的迁移率处在低水平,从1.99%下降到1.01%;48~69岁处在极低水平,从0.90%一直下降到0.48%。

与2000年相比,2010年整体迁移水平提高了,每个年龄的迁移率均在增长,青壮年迁移率增长最快。18~19岁的高校在校生,2010最高峰值是2000的1.6倍,反映了高教产业化(扩招)的影响。2000年劳动力迁移率高于2%的年龄段为18~27岁,2010年两端延长到15~35岁,底部大大加宽了,即便在36~39岁迁移率也不低于1.70%。

从务工迁移模式看,2000年务工迁移率从15岁开始加速上升到19岁的最高峰值(2.43%),之后一直下降,25岁为1.48%,30岁为1.03%。而2010年,务工迁移率16岁就已经上升到2.1%,务工迁移的底部较宽,18~23岁保持在3.12%~3.54%的峰值,24岁后由2.80%缓慢下降到29岁的2.06%,35岁的1.48%,41岁的1.06%。也就是说,2000年务工迁移率在23~25岁下降较快,30岁以后进入低水平,小于1%。但2010年务工迁移率30岁以前保持较高水平(2%),30~35岁不低于1.50%,直到42岁以后才进入低水平。由此可见,2000年迁移主流集中在未婚和部分新婚年轻人群体,I类个人迁移比重较高,而2010年24~39岁已婚青壮年也加入迁移主流,分散风险的II类家庭劳动力迁移大幅增加,比重相应增高。

2010年,0~12岁累积迁移率为14.37%,24~36岁为38.62%,24~45岁为60.18%,16~23岁为55.06%。24~45岁的累积率比是2000年(34.90%)的1.72倍。24~36岁与0~12岁累积率之差除以24~36岁累积率(儿童留守率)为0.6279,说明有62.8%(大约3/5)的儿童留守。24~45岁男性累积率(66.87%)与女性累积率(52.43%)之差除以男性累积率得到妻子净留守率为0.2172(21.72%),说明大约有1/5的妻子没有和丈夫一起外出打工。考虑到部分妻子单独外出打工,丈夫留守的情况,则夫妻因打工而暂时分居的比例高于1/5,大约在1/4左右。以上数据分析证实了21世纪00年代迁移从个人到家庭行为的转变,符合斯达克劳动力迁移分散风险的理论,也支持本文提出的市场化提高风险而增加II类家庭劳动力迁移的假设。经济学者常常强调迁移对家庭的汇款效应和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但忽略了大量家庭因分离所产生的巨大代价。

（五）迁移返乡趋势

21 世纪 10 年代,内地许多省份作为迁出地出现了劳动力回流。从图 6 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趋势。返回户籍县的总人数是外省返县和本省返县人数的总和,2000 年为 550 万,2010 年增到 1 088 万,2015 年继续增到 1 400 万。而外省回乡人数从 2000 年的 195 万增到 2010 年的 253 万,2015 年增加到 492 万。2015 年返县、返市、返省的总数为 1 536 万,其中 36.6%返回到城市街道,23.2%回到镇,30.1%回到乡村。由此可见,大部分回流迁移返乡不返村,对小城镇的发展会起到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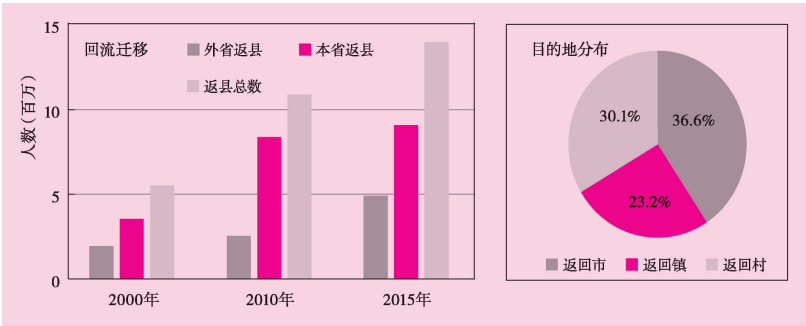


图 6 2000～2015 年返回户籍县的回流迁移及 2015 年目的地分布

注:2000、2010 和 2015 年本省或外省返回户籍县的数量是根据加权的五普、六普和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四、总结和结论

本文利用 1982～2015 年人口普查和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带,在小误差范围内推算不同年代 5 年跨县迁移数量和结构,分析其发展趋势,并与经济转型过程紧密结合。从 1982 年改革初期开始,中国 5 年跨县迁移数量经历了从慢到快的增长,再到近期转变为平缓下降。从 1982 年到 2010 年再到 2015 年,总迁移量从 2 863 万升到 1.46 亿,再下降到 1.32 亿,其中离开户籍县的临时迁移同期从 443 万增到 1.26 亿后微降到 1.18 亿,临时性的务工迁移从不足 200 万增到 7 033 万后下降到 5 707 万,而户籍迁入的永久迁移先微升到 2000 年 2 549 万,随后下降到 2015 年的 1 432 万。

本文发现,中国人口迁移的性质已经实现了市场化的根本转变,户籍迁移人口比重从 1982 年的 84.5%下降到 2015 年的 10.8%。这个迁移性质的转变与就业市场化相平行,大量劳动力的迁移为城市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转型提供了动力。此外,务工迁移的增长趋势与城镇化和工业化密切相关,是实现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变的最重要因素。然而,转型前期务工迁移与工业增长并不同步,甚至背道而驰。21 世纪 00 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同步高速增长,而 2012～2015 年受逆转型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同步下降的局面。

本文还发现,中国人口迁移已实现从个人行为到家庭行为的转变。21 世纪 00 年代中,已婚青壮年(24～45 岁)迁移率大幅提高并取代未婚人群成为迁移主流,儿童留守

率高达 62.8%,中青年妇女的净留守率也有 21.72%,表明市场化后风险的大幅提高迫使家庭居住分离,以劳动力迁移的策略来分散风险。然而,一旦克服风险约束后,回流开始增加。

1970 年以后,日本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结构转型,经历了流动性下降,并持续到现在。面对同样的情形,中国也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出现人口迁移持续下降的趋势。“刘易斯转折点”这个术语是否适用于这一转变,值得商榷。中国的经济转型有许多独特之处,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后,“务工”的劳动力越来越缺乏,但极度扩张的高等教育又为新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知识型劳动力”,在新产业层面又进入刘易斯古典假设。未来儿童和老人的迁移率会随着户籍政策的放宽而提高;青壮年迁移率也有望随着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而继续提高。但是,迁移率的提高否能抵消年轻人口下降的负影响还有待观察。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户籍政策的放宽,经济改革的深入,未来人口迁移会有一个从量到质的转变,层次结构的变化会显得比量的变化更重要。根据本文的分析,可以预期未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以及妇女、儿童和老人的迁移率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政府应尽早制定新的人口迁移政策,尽可能减少户籍制度的负面影响,使未来人口迁移更有效率,更家庭化、完整化和长期化。

参考文献:

1. 蔡昉(2008):《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陈锡文等(2008):《中国农村改革 30 年回顾与展望》,人民出版社。
3. 盛来运(2008):《流动还是迁移: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经济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
4. 段成荣等(2017):《21 世纪以来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变动趋势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 6 期。
5. 段成荣等(2019):《中国人口的迁移转变》,《人口研究》,第 2 期。
6. 马忠东、王建平(2010):《区域竞争下流动人口的规模及分布》,《人口研究》,第 3 期。
7. Fan, C.C.(2016), Household-splitting of Rural Migrants in Beijing, China. *Dialog: A Journal for Planning and Building in a Global Context*. 116/117: 19-24.
8. Lewis, W.A.(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20(2): 139-192.
9. Harris, J.R., and Todaro, M.P.(1970),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1): 126-142.
10. Stark, O.(1991), *The Migration of Labor*. Basil Blackwell, Cambridge.

(责任编辑:朱 犁)